

张天翼的文学道路

ZHANG TIAN
YI DE
WEN XUE
DAO LU



黄侯兴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张天翼的文学道路

黄侯兴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艺知识丛书

(沪)新登字103号

责任编辑：高国平

封面设计：朱展程

文艺知识丛书

张天翼的文学道路

黄侯兴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8.375 插页 4 字数 115,000

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500册

ISBN 7-5321-1057-5/I·785 定价 5.20元

编辑前言

“文艺知识丛书”是一套普及性的读物，以高等院校文科学生、中学语文教师和广大文艺爱好者为阅读对象。编辑这套丛书的目的，主要是想为读者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、阅读中外文学史和文艺作品，提供一些辅助材料。

丛书的内容包括文艺的基本原理和常识，中国古典文学、现代文学、当代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等方面。在编写工作中，力求能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针，对文艺科学中的各种理论问题，对中外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、作品、文艺思潮和流派，进行科学的介绍和分析；丛书的具体写法，提倡百花齐放，不拘一格，文字尽可能生动活泼，深入浅出。

张天翼是我国著名的讽刺小说家、儿童文

学家。黄侯兴的《张天翼的文学道路》，对张天翼的创作历程作了清晰的勾勒，对张天翼的各类作品进行了中肯的评论。张天翼的作品，贴近人民的生活，富于讽刺和幽默，善于在人生的一瞬中透视丰厚的人物性格，描绘人物的线条明净而不驳杂，擅长狄更斯式地提炼人物的习惯动作与用语，抓住人物的灵魂而廓大其细小特点。黄侯兴对张天翼的讽刺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，作了很好的阐述。

编辑这套丛书，对于我们来说，是一个新的尝试，恳切地希望广大读者和专家们能提出宝贵的意见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93年5月

目 录

一	五四前后的生活印记	〔 1 〕
二	在探求中叩进文学的大门	〔 12 〕
三	从象征主义向现实主义跨越	〔 26 〕
四	文坛上的“新人”	〔 36 〕
五	清道夫的神圣职责	〔 57 〕
六	观照五色斑斓的社会人生	〔 88 〕
七	“探索人性,发掘人性”	〔113〕
八	短篇创作的独异色彩	〔130〕
九	在褒贬毁誉中重评《鬼土日记》	〔169〕

十 长篇创作的成败得失 [189]

十一 在童话创作中的卓著贡献 [221]

跋：一点余想 [256]

一 五四前后的生活印记

张天翼，1906年9月26日（丙午年八月初九），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，祖籍湖南湘乡一字庠。原名张元定，号一之，小字汉弟。笔名除张天翼外，还有张无诤、铁池翰等。

湘乡出了个曾国藩。因为他的特殊权力，此地近代儒生想做秀才举人的就多起来了。在张天翼的父辈里，中举的就有他的父亲和一个叔叔。张天翼的父亲张通谟，光绪年间中举，参加清末“经济特科”考试得中进士，被委任为江苏江宁知事，但未就职。他为人耿直，洁身自好，喜欢饮酒做诗，擅长书法，做过教员、职员，长年携家带口漂流异乡。晚年赋闲，靠卖字“润笔”为生。1938年，于抗战烽火中离开杭州避乱，客死于浙江嵊县。张天翼便是出身在这样一个破落了的

世家望族里。据张天翼回忆，他父亲是一个“诙谐的老人，爱说讽刺话，待儿女像朋友，让儿女们去自己发展，他不希望儿女像他自己一样”。^①他父亲说过，“四书不应该给小学生读，只能给大学生学哲学的去研究”^②。张天翼的母亲魏茂光（澄如），出身书香门第，能读会写，1959年逝世，享年90。张天翼常称赞母亲的聪慧与开明，说“母亲是个多感的人，她常给我说故事，有一次说林译的《孝女耐儿传》（Dickens; Curious Shop），感动得直流眼泪”。她“不干涉儿女的思想，嗜好，行动，可是给了儿女很大的影响”^③。

张天翼兄弟姐妹五人，长兄张元骞，二兄张元宪，大姐早逝，二姐张稼梅。张稼梅是“五四”时代新女性，曾就读于上海启明中学。她比天翼大16岁，曾教他读书识字。张天翼说二姐对他的影响很大。

张天翼的父辈虽是弄“八股”出身，但都开明通达，顺应潮流。他们不是靠威严与训海来维持家庭的秩序，而是注重对子女进行新的思

① 《我的幼年生活》，《文学杂志》1933年第1卷第2期。

② 《论〈阿Q正传〉》，《文艺阵地》1941年第6卷第1期。

③ 《我的幼年生活》。

想文化教育,让子女们的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,大胆地放他们到广阔的人生海洋里去游泳。正是在这种民主家庭的生活氛围中,张天翼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。应该说,张天翼后来走上文学的道路,并以讽刺与幽默见长,都渗透着父母亲和二姐对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;然而在文艺修养上,张天翼较多地受了旧文化的熏陶,他没有像他父辈那样趋向新思潮,而是在思想解放运动高涨时期扮演了一个“小老头”的角色。

1912年1月,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,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。张天翼的父亲和大哥都到临时总统府谋职。可是不久他大哥病故了。4月,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,临时政府迁往北京,他父亲失业了,带领全家离开南京,几经周折,最后才定居于杭州。1913年,张天翼8岁,父亲送他进杭县县立高等小学(后改名杭州佑圣观巷小学)读书。这所小学没有丝毫的活气,初小课程都是《孟子》之类,学生进进出出都要对孔子的牌位行鞠躬礼,这使张天翼产生极大的反感。他说他那时“功课没一样行的,只有和同学打架,说故事,是拿手。到高小以后别人叫我‘蛮牛’,‘野牛’,也有人叫我‘小热

昏’”。^① 虽然如此，这里毕竟是他发蒙的地方，使他难忘。

张天翼课余回家仍爱听父母讲故事，晚间便听老王妈讲徐文长、《屁弹铜匠》之类。在民间传说中，徐文长是一位带有喜剧色彩的幽默大师。张天翼幼年从关于徐文长的幽默故事中汲取了文学营养。此外便是读中华书局、商务印书馆印行的童话集，以及《说岳》、《杨家将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》、《彭公案》等中国古典小说。家中线装书藏得不少，他也常常随手取来翻看。

上小学以后，张天翼仍然很顽皮，除了打架斗殴，便在家里翻腾起来。不过，从他的一些活动来看，我们可以发现他早期对文艺的兴趣。那时，每逢暑假或寒假，他就和比他小三岁的外甥，在家里开起“大戏院”，把骨牌凳翻过来当舞台，在厚纸上用彩色画了花脸、胡子、花旦，当作戏子。晚上放映“电影”——在一些玻璃板上画着各种怪脸，靠着灯光投影到床上。“大戏院”关了门，“书店”就开张。张天翼那时对开书店、

① 《我的幼年生活》。

办报刊似乎已经有了一些常识。他把知道的故事写成小册子，每册三四页。此外还杜撰了些故事，一面还出“日刊”。

1920年秋，张天翼小学毕业，升入杭州宗文中学读书。这时，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了一年，但在这所全省闻名的学校里，却依然被保守陈腐的沉闷的空气包围着。从校长到教员，几乎都起劲地反对白话文，教科书一律采用文言，禁止学生看小说。学生的思想遭到严重的禁锢。张天翼后来说，“这些教育，把我在思想方面训练成当时的一个好学生。我虽然也跑跑跳跳，可是精神方面倒的确是一个小老头儿。”张天翼课余之暇常读林琴南翻译的小说，如《撒克逊劫后英雄略》(Ivanhoe，今通译《艾凡赫》)一类。林琴南是一个复杂的人物：他一方面是西方文化艺术的介绍者，通过引进西方近代文化思潮给中国文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；另一方面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。张天翼也盲目地跟随着站在“保古”的立场上认为，“凡是新式的小说总不会好的”，虽然自己一篇也没有看过，“可总信自己这个判断没有错”。①

① 《论〈阿Q正传〉》。

中学阶段,张天翼除了读《福尔摩斯》、《亚森罗苹》之类的侦探小说外,“鸳鸯蝴蝶派”的作品对他有着强烈的吸引力。他那时已经开始尝试着写小说,在同班同学中,有好几个也对文学有浓厚兴趣,他们之间相互激励、相互影响。张天翼或用文言或用白话写侦探小说和滑稽小说,但“决不肯使用标点”;他甚至认为,“她”字当作女性的第三人称,“当然也是异端,概在排斥之列”。他在《礼拜六》、《半月》、《星期》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讽刺新诗、讽刺男女自由恋爱和妇女争求解放的小说。不过,这位“小老头”究竟要维护什么,反对什么,维护的或反对的是否有道理,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,因为这些确实是他“自己一无所知的东西”^①。

张天翼在莫名其妙地反对新文化一阵子以后,偶读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,使他有“说不出的不安”,从中窥见了自己灵魂深处“也有阿Q的灵魂原子”。张天翼从此反省,他越觉得自己像阿Q,就越觉得自己过去所尊敬的林琴南大师以及中学校长们,“都像赵太爷”,张天翼因此表

^① 《论〈阿Q正传〉》。

示，“我如果要不再生像阿Q那样糊里糊涂做人，我只有从未庄文化的圈子里跳出去，不再怀着我不知其然的那些成见，并且要不再自欺自的想出些话来安慰自己，而勇于正视自己的毛病。”“总之，不再作阿Q！”^①

张天翼从《阿Q正传》中吸取了有益的思想成份，也吸取了丰厚的艺术营养。他开始意识到，鲁迅笔下的阿Q，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物，而是从千千万万个阿Q提炼出来并加以典型化了的艺术形象；而且，鲁迅并不注重写阿Q的皮肉，即阿Q生存、活动的外部现象与特征，而是着意发掘阿Q的灵魂，暴露出在他灵魂深处那些已经发霉了的“精神胜利法”。张天翼幼时受清末滑稽小说、侦探小说的影响，追求小说的故事性与趣味性，现在他的文艺观念开始发生了变化。他从《儒林外史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阿Q正传》等作品中获得了新的艺术感受。他觉得这些作品之所以使人爱看，经得起看，“多看一遍就可以多领会到一些东西”，并不是因为故事曲折生动，这艺术的魔力来自于作家深刻把握着的

① 《论〈阿Q正传〉》。

现实主义。张天翼那时常常思索这样一个问题：“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，三四句话就说得明白的，又并不怎么有趣，为什么竟写上那么厚一部书呢？而竟有这么多人给它迷住了呢？”^①

张天翼创作思想的转变，当然主要的是受当时进步的社会思潮的影响，但是学习鲁迅的作品，以及中外优秀的古典作品，不能不说是他后来有可能摆脱“未庄文化”、摆脱“鸳鸯派”影响的重要因素。

1924年秋，张天翼中学毕业后，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，校长刘海粟。他的兴趣从文学转向绘画，后因学费昂贵，又对课程不满，学画近一年即辍学回杭。张天翼学画未能成功，但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所独具的艺术风格，是蕴含着中西绘画及其美学理论的深刻影响的。如重视从客观到主观，从尚形到尚意，从景到情，然后又以主观、尚意、达情为主，形成小说完整的意境，便是我国古代山水画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小说创作中的运用。

1925年秋，张天翼从上海来到北京，次年

① 《谈人物描写》，连载于《抗战文艺》月刊1941年11月第7卷第4、5期合刊，1942年6月第7卷第6期。

夏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，住在北大附近（沙滩）的一个公寓里。课余时间，他贪婪地阅读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以及新出版的中外文艺作品，并常常与潘振武、潘训（即潘漠华）、赵平复（柔石）、邬光煜、周颂棣、姚蓬子等学友聚谈时事、哲学、文艺诸问题。

这种聚会，从当前国内形势、社会舆论谈到文坛近况——新出版的有什么杂志、什么人的著作；从中国的古典文学谈到现代世界文学中的各种流派和风格；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前几年在文学主张上的对阵，谈到鲁迅和郁达夫的小说，谈到近代中国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等创作方法在文艺作品中的运用。在海阔天空的闲谈中，张天翼这时的政治倾向与美学观念已经比较明显。他不赞成“为艺术而艺术”，所谓“象牙之塔”的文艺是不存在的；他认为文学艺术应当是写实的，反映人生，描写人生，应当披露现实生活中丑恶的、不合理的现象。他对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有着较多的共鸣。

张天翼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，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高潮到来。这时革命中心已经南移。他虽然身居于斗争漩涡之外，但十分关注南方